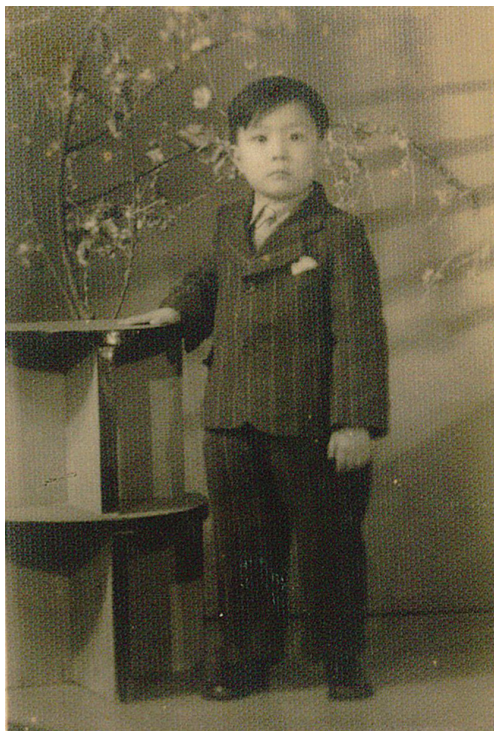


崇川往事

大王庙小学旧事(上)

□李大潜



童年李大潜



童年李大潜与弟弟李大耀(右)

我的小学学习生活是在南通大王庙小学度过的。这个小学曾先后改名为城南小学及城中小学,是南通市的一所百年名校。它原先坐落于我家大保家巷1号附近,现在已迁到濠东路新址,面目及规模都已焕然一新、今非昔比了,但在我的脑海中深深留下的还是它昔日的光景。

尽管我和高中时期的母校南通中学及初中时期的母校商益中学(现启秀中学)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接触,但与我小学时期的母校却缺少因缘,一直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系,不免有愧于心。今年10月,我回南通颁发在南通中学设立的馥华奖学金,下榻文峰饭店崇文阁。一日收到南通中学一位老师的短信,核实我是否是城中小学的校友,我当即告知我确实曾是城中小学(原大王庙小学)的学生,1947年五年级肄业,并提供了几位我当时老师的名字。不久,城中小学沈蓉校长及两位副校长在启秀中学原教导主任杨成(杨乐之弟)的陪同下,专程来到文峰饭店,成了我离开母校后和校方的第一次接触。大家言谈甚欢,也促成了我对尘封近八十年往事的回忆。虽然只是点点滴滴,但仍似在眼前,不免感慨系之。现在信笔写下来,算是对母校的一个迟到而不像样的汇报吧!

我1937年11月10日(农历十月初八)出生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岁月,不久淞沪战事即悲壮地画上了句号。1938年3月17日,日本侵略军攻陷南通。为避日寇,不久,父母带着我和祖母一起移居上海法租界,暂住巴黎新村一公寓楼。为送我进小学,1941年下半年全家返回南通。在上海三年左右的时光,对于我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,只记得当时的住处靠近法国公园(现复兴公园),母亲常抱着我在那儿游玩、散步,我还留有将一只漂亮的玩具帆船放进那儿大水池中的记忆。这个公园是仿照巴黎的卢森堡公园建造的,多年后我旅居巴黎,总喜欢去那个公园散步,

因为它多少会唤起我童年的回忆。那时,我母亲已督促我读书识字,我还曾因学习不认真被母亲拉到洗手间打了几下屁股,这是出身幼儿教师学校的母亲一生中唯一一次对我的体罚。看了我小时候在上海穿西装的照片,似乎是很神气的,但逃难住在租界,生活上大概只可以勉强维持温饱,后听家里人说,祖母偶尔要吃一次冰淇淋,还要先把我抱开,以免我争着要吃。在上海期间,我也上过幼儿园,记得它的名字叫“阜春”。那儿的大壁橱上,每人都有一个专门的小柜,用以暂存自己的物品,这种东西在家中是没有的,反而成了我唯一留下的记忆。

1941年全家返回南通,住进了大保家巷1号的老家。大保家巷是南城(江山门)内的第二条东西向的巷子,我家在其最东侧。转弯处是南北向的丁古角巷,大王庙小学的一个边门(后封闭)就在那儿。从我家出发,大概两分钟即可到达,这个家门口的学校,大概也因此就成了我入学的首选了。校舍原先是一个庙,想必就叫大王庙,一开始我还见到过已被请下神坛的几尊佛像,后来就不见踪影了。从1942年入校一年级学习到1947年五年级肄业进入初中,我有整整五年时间在大王庙小学学习。童年是美好的,我们那时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业,学习无拘无束,十分愉快,加上我学习一直相当顺利,在班级里总是名列前茅,老师及家长都很喜欢,日子过得十分舒坦,但也相当平淡,留下的记忆并不是太多。

大王庙小学后来的大门,在丁古角巷的南端向东的环城南路。进门的左侧,是一些教室及一个二层的办公楼,楼上曾用作单身教师的宿舍。进门的右侧,那时是一片空地,上面有一些树木,我们看来都很高大,还有一个我们最感兴趣的所在,是一个小小的动物园,其中记得有一只孔雀,还有几只关在笼子里的白兔,不时有人用白菜来喂养它们。这

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大自然,感受到无穷的乐趣。若干年后,这块空地上新建了教室及办公室,就再也难以寻觅自然的踪迹了。

因为学习及表现出色,我曾好几次由学校派遣参加一些名流或老师的婚礼,在南通当时最负盛名的宾馆——有斐馆的金碧辉煌的大厅中,由我和一个同班的女同学提着婚纱的下角,在乐曲声中随着新娘缓步进入婚礼的殿堂。在很小的年龄就见识了很大的场面,多少是一种历练。在二三年级时,我还代表学校参加过全市小学生的一次讲演比赛,比赛的地点在通师一附的一个教室。我以菊花为题做了讲演,以第一名的成绩捧回一个银盾奖品。讲稿是由尤若愚老师帮我写的,她也是我母亲的一个挚友。我没有任何思想负担,相当自如地做了讲演,讲台上正好放着一盆菊花,我还特意提到了它。这次讲演比赛的得奖,事前事后都没有任何炒作,后来在整个中小学阶段除体育竞赛外不再有任何赛事,这竟是我在中小学时代唯一得到的奖品,而得奖后一返回大王庙小学,就立刻将其抛在脑后了。现在想来,这样无拘无束地参加竞赛,不抱任何功利的动机,可能是更有利于一个学生的成长的。

小学五年级时,日本投降,举国欢庆,学校里也扎了很多V字型的纸灯(V代表英语VICTORY(胜利)之意)庆祝。在日本占领期间,在现在博物馆前濠河边的马路上,总有日本兵在那儿站岗,连我们小孩也不敢走近。还记得一天清晨,突然一些伪兵敲开大门,把还睡在床上的我们及周围邻居都叫起来,押送到南通中学的操场上听日本人训话。可能谈的是“清乡”(即围剿郊区的抗日武装)的事,虽然会后仍把大家放回,但当时的惊恐万状,构成了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的梦魇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,给了幼年的我一个最早的教育:没有国家的独立与富强,绝不能有个人的幸福与成长。

海陵旧话

如海河
——如皋、海安两县
改造高沙土的壮举

□程太和

1958年11月23日,如皋、海安两县出征民工近8万人,开挖如海河工程。至1959年5月25日如海河工程竣工。

新中国成立前,由于战争连年,水利失修,给农业生产留下无穷隐患。解放初期的如皋、海安中西部地区,是大雨大灾、小雨小灾、无雨旱灾。1949年,如皋、海安两县同时遭暴风雨袭击,如皋江港堤防决口40多处,海安里下河地区多处圩堤破堤。1954年夏,由于长期连续阴雨,如皋、海安两县数十万亩农田被淹。灾害频发,给两县农业生产与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危害。两县高沙土地区曾流传这样的民谣“一朝大雨水汪汪,三日不雨灰沙扬,高处火烧低受淹,十年就有九年荒”。两县领导深感兴修水利、改造高沙土的迫切性与重要性。根据两县地形地貌与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,两县中西部地区需要开挖一条南北向的大河通往长江,这样,既可排涝又可灌溉,改造两县西南部地区的高沙土土壤,还可引长江水串通如泰河、栟茶河,为海安、如东两县的盐碱地洗碱改良土壤。时正值“大跃进”运动伊始,经南通专署批准同意,两县果断决定启动开挖如海河工程。

如海河工程是如皋、海安两县团结协作共同奋战的工程。如海河原计划将两县通往长江的一些弯曲、断续的小河、小沟、小港进行去弯、拓宽、疏浚、延伸,以减少工程动土量、农田占用量与房屋拆迁量。但经实地考察后发现,事实上并没有几条像样的河段可以利用,尤其是海安境内,河流断断续续,很难利用。于是两县领导经反复讨论研究,决定直线开河。现在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出,如海河基本上就是一条直线。

当年参加开挖如海河工程的民工现在基本上都是80岁以上的老人了。据一些老同志回忆,当年的如海河工程到处是红旗招展,人山人海,号子连天,民工挑土运土的队伍达几百米。“奋战两个月,拿下如海河”“开挖如海河,改造高沙土”“人勤地不懒,老天怕好汉”“如海人民斗志高,战天斗地换新貌”的横幅标语随处可见。那热火的场面,冲天的干劲,豪迈的号子,令人难以忘怀。这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变落后生产条件,加快农业生产发展,提高农业产量的强烈愿望,也证明如皋、海安两县做出的决策顺应了人民的意愿。如海河工程与通往长江的节制闸(碾砣港闸)同年竣工。碾砣港闸16孔,净宽66米,耗资236万元。最大排涝流量每秒495立方米,负担如皋、海安两县排涝面积160万亩,灌溉87万亩。1959年6月,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为碾砣港闸题词:“碾砣港闸的建成,是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保证。”国务院副总理陈毅题词:“水利是万事之利。”原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题词:“碾砣建闸,兴利除害。发展生产,造福人民。”如海河、碾砣港闸的建成,长江水引到了如皋、海安中西部地区,改造了两县的高沙土,还洗掉了如皋北部地区以及海安、如东一些地区的盐碱地里的盐分。如海河在如皋、海安的水上运输上也发挥着巨大作用。现今的如海河,经多次拓宽疏浚,两岸驳坡,旺水季节可通过千吨级货船,成为苏中地区重要的水上交通干线。